

張國燾

脫離共黨面面觀

尼 司 編

新中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張國燾脫離共產黨面面觀

每冊實價國幣三角

編著者

尼

司

印行者

新中國出版社
廣州多寶路三〇號

目次

(一) 張國燾在中共的歷史與地位……………一

(一) 張國燾的身世

(二) 加入共黨

(三) 「南昌暴動」前後

(四) 「立三路線」前後

(五) 脫離共黨

(二) 張國燾脫離共黨文件……………八

(一) 共黨緊急會議與處分

(二) 張國燾的聲明啓事

(三) 中共領導人周陳秦之公開信

(四) 張國燾告國人書

一 張國燾在中共的歷史與地位

(一) 張國燾的身世

張國燾，字特立，江西萍鄉人，現年四十四歲，爲共產黨元老派領袖之一。就他的身世說，實在是一位公子少爺，他在萍鄉還是一個擁有良田三千畝的大戶，是所謂世代書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做過幾任道台，祖父是翰林，就是他的父親吧，也是一位孝廉公，他的叔父，在民國以後曾做過國會議員。所以就家庭來說，張國燾真可說是一位世家子弟。

他在江西南昌的江西省立中學校畢業後，就考入了國立北京大學。

(二) 加入共黨

那時正是「五四運動」之際，青年界的思想很混亂紛雜，凡是外洋來的學說思潮，一概都歡迎。其時，中國共產黨的首創人之一的陳獨秀，正任國立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長，與同在

北大任教兼圖書館長的李大釗，結合許多朋友，組織一個馬克斯主義學術研究會，發行「每週評論」，極力鼓吹階級鬥爭，及勞工專政等言論，張國燾當時思想上受他倆人的熏染也很大，當然是該會的會員之一，且常在「每週評論」上寫文章。

其後，陳獨秀到上海，與陳望道施存統等組織馬克斯學術研究會，發行「工報」，「職員報」，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三人分任編輯。張國燾在這個組織中，還沒有露什麼頭角，不過偶而寫點文章而已。

一九二一年三月，北京與上海這兩個組織漸漸合流，且與第三國際發生密切關係，五月間，在上海蒲石路漁陽里開成立大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張國燾與毛澤東，彭述之，楊明齊同被選為候補中委。

一九二二年九月，共產黨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也參加，復被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從此以後，共黨每屆大會，張國燾都參加，且都當選，此為元老派名稱之由來。

中共第三次大會之際，有瞿秋白領導下之留俄派與毛澤東領導下之湖南派之鬥爭，北方

則有張國燾與李大釗之鬥爭。張國燾在北方因工作努力，頗有羣衆，譏李大釗爲右傾及官僚主義，表示極度不滿；而李大釗則以張國燾處事過於激烈，每效列寧口吻，譏爲左傾幼稚病，但又忌其有羣衆，故排斥甚力。李張兩派，大起衝突。後來陳獨秀出而調解，派張國燾往蘇聯考察，就算給李張都有一個大面子。

(三)「南昌暴動」前後

一九二三年，共產黨奉第三國際之命，加入國民黨。北伐開始，進軍極速，國民革命軍克復江西時，江西共黨發展頗快，張國燾因爲是江西共黨前輩，至此，乃奉共黨中央之命，任江西區委（後改省委）書記，綜理全省黨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黨在武漢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亦參加，且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時湖北共黨發展甚快，工作較江西重要，須得幹員主持，故共黨中央調張國燾爲湖北省委書記，主持湖北全省黨務。其時中共中央亦在武漢，共黨中心勢力即在湖北，可見

張國燾地位之重要。而那時的張國燾，亦紅極一時。

但未幾，武漢分共，張國燾乃東走江西，至南昌，參加八月一日之「南昌暴動」。張國燾任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委員會下，尚有一農工委員會，張國燾兼任該會的主席委員，時江西省政府，亦隨革命委員會南行，張國燾亦係省政府委員之一，故在南昌暴動中，張國燾地位極爲重要。

當革命委員會隨賀龍葉挺入粵，張國燾亦隨行。不幸在潮汕遭慘敗，與惲代英同自惠來逃潮陽，預備自潮陽渡海走汕頭，轉赴上海，不意在潮陽與代英同爲被捕，後來幸而中途脫逃，得輾轉至滬。

是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開臨時擴大會議，與毛澤東同受處分，因爲他犯了盲動主義，機會主義的嫌疑。其處分的決議如左：

「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之委托，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之後，主張聯絡張發奎，並反對

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右更壞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動搖。國燾同志應予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

一九二八年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會係第三國際直接指揮下而召開者，空氣極爲緊張，而對於武漢時代共產黨之錯誤，批判尤力。張國燾亦被派赴參加會議，因彼在當時係湖北省委書記，所負責任極爲重要，故其錯誤亦應負責，因此大受到會代表的批評，史大林聲斥尤力，咒罵爲機會主義者，尾巴主義者。六次大會的結果，張雖仍當選爲中央委員，却被留俄察看。

（四）「立三路線」前後

張國燾在留俄察看期間，可以說過的是反省生活。但不久又被派回國，最初奉令赴香港工作，旋即回滬，在共黨中央工作。當時共黨中央，方由李立三當權，所謂立三路線時代。

張國燾本有陳獨秀派的嫌疑，蓋彼與陳獨秀彭述之輩，黨員同稱爲元老派領袖。故此際張國燾在中央，不僅無權，且頗受壓迫，其後竟以反對派的嫌疑，被押赴俄京軟禁。

幸未幾立三被推翻，立三路線亦倒，反立三路線的人皆得重用，張國燾亦歸國，在蘇維埃區工作。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時，當選爲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正主席是毛澤東）兼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在共黨中的地位，可謂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反羅明路線以後，毛澤東獨握大權，張國燾又是失意了，大受毛的欺壓；幸張國燾應付得法，還不致被殺害。國軍的五次圍剿，蘇區是漸漸不能立足了，內部依然還有鬥爭，徐向前的偽四軍在張國燾的主見之下，便西竄入川，宣告獨立，毛派大憤。

後來毛澤東也率其部屬到四川，二軍會合，怒目相向，毛主席取消川省蘇區，北上打通國際路線，張徐則主南下，終於毛派得勝，於是分頭北上，被攔在今日的邊區。偽四軍於流竄之際，後在河西被解決，毛亦坐視不加援救。其後，張國燾更受毛的奚落，留黨察看，備受侮辱，雖力自低聲下氣，以求苟全，然其代理邊區主席，亦不過是羈縻備位而已。至留俄派

之陳紹禹張聞天秦邦憲等，黨齡甚輕，爲第三國際竭力扶植而成之新進分子，張國燾則爲元老派之一，其積不相能，由來已久。故在徐向前部僞四軍消滅以後，張在共黨內，實有一牆倒衆人推一之勢。

(五) 脫離共黨

張國燾在這種環境之中，其不能自存，而求脫離壓迫，自爲當然之事。

此次脫離的經過，頗爲有趣。據聞今年民族掃墓節，張國燾亦因地方行政官吏之一的資格，出席參加，托詞被邀南下，哄走了隨來監視的同志，遂乘謁陵汽車直抵西安，並未與任何共黨份子相見，更未訪林伯渠，直到漢口以後，才向共黨提出意見。故不僅是西安陝北爲之詫異，就是莫斯科也大爲奇怪，而國民黨也莫知其所以然。至陳周秦覆子健的信（見後），其中所敘述的經過情形，據說是共黨專給下級同志看的一面之詞。

二 張國燾脫離共黨文件

(一) 共黨緊急會議與處分

張國燾的脫黨申請書是四月十三日提出的，內容無從探悉。但探說措辭極溫和，而內容要點和他的聲明啓事差不多，並沒有提出脫黨的要求。這只能說是意見書，不能認爲就是脫黨申請書。

共黨接到該意見書後，武漢的共黨領袖份子，就在陳紹禹的召集之下，在府西一路的新華日報社開一次緊急會議，長沙的徐特立也連夜趕來參加，結果分電屠施與莫斯科，莫京的回電是開除，當然遵辦，乃於四月二十日，宣佈「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通告書，在其機關報新華日報上發表，茲抄錄如下：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離中國共產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爲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的反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僞中央

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採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然毫無改悔，最後竟以書而申明自行脫離黨。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布。」

(二) 張國燾的聲明

四月二十二日，張國燾在掃蕩報刊登聲明啓事；其措詞尚誠懇，原文如左：

「閱讀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之決定」一節，本人特爲如下簡單之聲明：（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

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效力。（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感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卽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張，用至誠態度，與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料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開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該決定內所說各點，均不必急於答辯，甚望中共中央和中共諸同志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並與本人誠懇商討，不使稍有遺憾，俾吾人與全國人士，均得共本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之主旨，向前邁進，則幸甚矣。」

（三）中共領導人罵陳秦之公開信

四月二十八日，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第二版，刊登一則「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先生答覆子健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子健有無其人，我們可不必研究，可是當可當做共產黨對其黨員的一件訓令來看。茲錄原信所述與張國燾事件有關之一段如左：

子健同志！

四月二十六日來信收到。你來信所提的兩問題，最近還有兩個同志來信問過；所以我們決定把你的信發表，並公開答覆你，同時，也就作為對其他兩同志來信的答覆。

首先應當指明的，就是你對於這兩個問題的了解和解釋，基本上都是正確的；這證明我黨同志對於目前，政治問題及黨的問題，平時能嚴格注意和正確了解，這是值得欣慰的事。為的使你和其他同志對這兩個問題有更具體更深刻的了解，茲特詳為解答如次：

（中略）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問題，新華日報四月二十二日所發表的「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決議」，已經簡明地指出張國燾被開除出黨的原因，原文如左：（略）

，見前）

由此可見，張國燾之所以被開除出黨的直接原因，是由於他因爲在政治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不信任及對於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因而走到在組織上破壞黨的紀律，自由離開工作，從陝西私自跑來武漢作反黨和破壞抗日團結的活動。

的確如來信所說：張國燾在黨內是一個著名的老機會主義者和小組織者，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他始而站在「左傾關門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國共合作的政策，繼而在一九二七年時，又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與陳獨秀一起造成革命失敗的嚴重錯誤。當時大家都曉得，對機會主義錯誤負主要責任的，即爲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等。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次大會時，張國燾雖承認了他的錯誤，但在大會後在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時，又犯了對許多政治問題有右傾傾向及參加少數中國學生的反黨反國際的右派小組織活動，而這種右派小組織，當時曾與托洛斯基派勾結，關於這一點，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會通過有專門的決議。當一九三〇年中國黨內反立三路綫鬥爭取得勝利時，張國燾開始表示承

認自己在代表團工作中反國際反黨的錯誤，並表示反對立三路線，一九三一年四中全會後，國燾回國，表示擁護四中全會決議及四中全會新選之政治局。黨爲給張國燾以在實際工作中改正錯誤和表現對黨忠誠起見，派他赴鄂豫皖區工作。在鄂豫皖區及四川通南巴區工作中，張國燾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其中重要者爲輕視軍隊中黨的政治教育工作，忽視建立地方黨組織及羣衆工作，特別是肅反工作中馬虎和對青年的不負責任和罪惡的態度。當一九三五年秋季，原一四方面軍會合於川西時，張國燾因爲在政治上估計中國革命已完全失敗，革命形勢已又如一九二八年六次大會時一樣的所謂「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落，於是主張採取完全右傾消極的機會主義路線；當其機會主義主張爲我黨中央拒絕時，並擅自成立僞中央以分裂黨的統一，破壞黨的紀律。一九三五年冬我黨中央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告訴他時，他表示懷疑。一九三六年秋，原二，四方面軍在朱德賀龍等同志督促和原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幹部要求之下，復出甘陝而與原一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路線的錯誤，雖經黨中央及全黨同志嚴厲指責，但張國燾時常採取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態度，時而承認錯誤，時而重複錯誤。對於

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始終表示懷疑和不了解；到西安事變時，更堅決主張繼續內戰方針，因而極力反對黨中央聯合全國一致對外的政策。中央爲教育幹部起見，特再三幫助他改正錯誤，並仍給以負責工作，希望他能在工作中學習和改正錯誤；不料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和反黨積習既深，勢難挽回，因而有此次擅離工作自動脫黨之舉。

此次張國燾從延安到武漢，以至被開除出黨的事實簡單經過如下：

四月四日，因爲張國燾在邊區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參加祭黃帝陵，可是祭陵完畢後，張國燾不通知我黨中央即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後，住西京招待所兩天，沒有與駐陝辦事處發生關係，只在火車快要開動前，用電話約林祖涵同志在車上略談幾句，即自動來武漢。到武漢後又不肯來駐漢辦事處，經我們三人屢加責勸才勉強搬往辦事處，當時他曾電告黨中央謂：「不辭而別，歉甚，願在武漢做些工作。」我們看到他這種態度，表示還有回黨工作可能，既來武漢，他是邊區政府負責人之一，當然應當晉謁中央政府領袖，報告邊區工作狀況，於是由恩來同志陪他晉謁蔣先生，不意在見蔣先生後，渡江至江漢關碼頭時，乘恩來同志

與另一同行朋友談話之際，抽身疾馳而逃，始在漢口繼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亂跑亂撞數小時，然後始在武昌寓住一個事先與別人約好的旅館中，我們見國燾深夜未歸，派人四出尋找，比得知他所住旅館後，即又於深夜渡江勸其返漢，當他不得已而返漢時，堅不願再回辦事處住，於是遂轉寓於一個朋友家中。在我們與他幾次談話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說：「國民黨沒有辦法，共產黨也沒有辦法。中國很少辦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見說：「我感覺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裏飯還有得吃的，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同時，他却又私自去找看陳獨秀等人。由此可見，張國燾在聲明中說什麼他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並未絕望等，完全係一種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談。

張國燾的政治觀點既如此悲觀，而個人行動又如此反常，我們知對他已無從遷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點辦法：（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最希望的）；（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時期；（三）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佈開除他的黨籍。當時他的回答認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條中考慮，並允兩日內閉門考慮後答覆。不料談話後不及一小

時，即十一日晚，張國燾竟跑到太平洋飯店，乘一有二人保護的汽車而去，臨行時，用書面寫交我們三人的信說：「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從此，張國燾便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因此，黨中央於十八日正式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於二十二日才將開除他的決議公佈，因為中央還希望他在脫離黨後或尚有所考慮。

只在開除黨籍的決定公佈後，張國燾才又派人將他寫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信同時送到，在二十二日的信上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突閱報載有開除黨籍的決定之公佈，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不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由此可見此次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首先由於他不能遵守一個共產黨員應當遵守的起碼的黨的紀律，由於擅自離開工作而至自動脫離黨。

由此可見，確如來信所說：「共產黨中央對每個黨員的黨籍問題，素持慎重態度，一而對於處理張國燾問題，真是已仁至義盡。由此可見，張國燾在聲明中假裝聲勢地說，好像他

正在拿誠懇的態度與我們三人談判政治問題時，中央忽而開除了他的黨籍，是一種完全抹煞事實的欺人自欺之談。當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細之人，初見張國燾聲明，或不免有以爲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似嫌過急，但凡是知道張國燾的爲人及此次事實經過者，相反地均恰恰異口同聲地說黨中央對張國燾太寬大了。其實張國燾早應開除黨籍，的確，在過去兩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以維黨紀，中央始終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個較老同志的錯誤；但是，張國燾既已不能再留存於共產黨的隊伍之內，共產黨爲黨的紀律，黨的統一和黨的政治純潔起見，只有將張國燾這類自甘暴棄於革命隊伍之人驅逐出黨。

對你所提兩個問題的答覆，暫止於此，以後遇有問題望不時來信，我們當盡可能地抽時間答覆你。此致

同志的敬禮！

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同覆

四月二十八日

附子健同志給陳周秦三同志的信

紹禹恩來博古諸同志：

我是一個在學校中工作的一個共產黨員，昨天我和兩個非黨員的同學談話中，發現了兩個問題，我雖然根據我所懂得的見解答覆了他們，但我自己不曉得我的意見到底是否完全對，所以決定寫這封信給你們，請你們抽暇爲我解答一下。（中略）

第二個問題是中央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問題——另一個談話的同學問我說：據張國燾聲明說，好像他不過有些政治意見想找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先生談談，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談判的過程中，便把他開除黨籍了，這是否太急了一點呢？我回答他說：開除張國燾的詳細情形，我還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張國燾在黨內的確是個著名的老機會主義者和小組織者，黨對他屢加教育和糾正，他却屢次承認錯誤後，又重犯錯誤，特別是一九三五年的重大反黨錯誤。的確早已值得開除黨籍；此次他又破壞黨的紀律擅自離開工作，當無應該開除出

黨；我絕不相信張國燾所說的話，我知道共產黨中央對每個黨員黨籍問題，素持慎重態度，此次開除張國燾黨籍經過，絕不會像張國燾在各報上登的聲明所說的那樣簡單。

我不知道，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解答對不對，因此，請三位同志迅速幫助我更清楚地了解這些問題，勿此，

敬致

布禮！

(四)張國燾告國人書

子健 上

四月二十六日

接着張國燾發表敬告國人書，在漢口正報，新民報，抗戰晚報，文摘相繼刊登，茲錄全文如下：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并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爲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因卽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爲商討，期於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卽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作種種謗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當卽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効力。
-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 （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

生爲全國惟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中央亦不否認；中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卽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 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採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尙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真理，偏執己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徵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爲惋惜者也。

當此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均有放

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般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到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着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

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一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口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惟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復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爲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爲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并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爲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爲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爲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牠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尙担负着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卽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爲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爲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爲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

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爲舉國 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爲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語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卽爲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牠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牠已起了

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為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締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為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一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藏着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近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

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佈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
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相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
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家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爲

國人所贊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面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面於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纍卵，更不願躬觀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猶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

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并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於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澈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時

張國森事件圖說

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綫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切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勢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一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

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爲愛護中共同人，更爲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亦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仰全體民族之福也。

三 張國燾對記者的談話

這件事很引起社會的注意，成爲新聞記者紛紛採訪的資料，各地日報曾先後發表了許多關於張國燾的訪問記。茲採錄浙江東南日報湖南國民日報通訊各一篇，以備一格。從這些通訊裏，也可以看出張國燾對時局的意見，及脫黨問題的陳述，頗足參考：

(一) 張國燾先生訪問記

記者懷着一種異樣的心情，驅車至張寓，他底公館是僻處在小山麓的一座小洋房。敲門投刺以後，司關的導我上樓，一個着藏青中山裝的中年人他立在樓梯頭，他便就是記者所要

訪問的張國燾先生，與記者握手，態度極爲誠摯，他導我進會客室，室內佈置除了一面方棹兩張靠椅，此外便是點綴在棹面的兩杯茶和一包大前門香烟，窗外的景色像一張掛在窗櫺上的風景畫，使這寂寞的小客廳生色不少。

張先生原籍是江西萍鄉，說話時略夾雜鄉音，他的體格十分健壯，容光煥發，這是十數年來磨練奔波的累積，要不是頭頂飄着幾根白髮，他真不像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談吐非常率直，極少時下名流的習氣。言語中夾着不必要的修飾和詞藻。如果一定要記點他底特點，那麼他底唯一特點便是說話時緩慢而經過沉着的考慮，有着政略家風度的思素和口才。

記者首先叩詢他這次離開陝北的經過，他欣然地談下去：

「我是四月三日離開陝北的，四月十一日到達武漢」。他一面招待他底青年訪問者喝茶抽煙，一面聚精會神地繼續談他底經過，「本人和中共的歷史關係極深，在不久之前，我還是一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代理主席呢！自然囉。這個僻處在陝北邊區的政治組織，因爲中央

政府並沒有正式明令發表，在法律觀點上說，它不能算做一個正當的地方機關。

至於這一次離開陝北的原因，純粹是和陝北少數的朋友意見不一致，到武漢後曾經發表過聲明，說明我本人的態度，素具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以及政府領袖的措施領導，本人亦誠擁護，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惟有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決不能再讓任何國際牽制以及階級利益而轉移目標，抵消力量，正因為這一個正確的分析 and 主張為中共少數的朋友所不能同情。自然他們的統一線的說法，本人也予以嚴正的批評。他們不但不能贊成我的主張，反因為「中共利益高於一切」的狹隘思想和恐慌心理所驅使，因有中共中央本年四月十七日開除本人黨籍的決定，以及決定啓事內的誣蔑和構罪，我想歷史的演進會使他們有覺悟的一天，認清中國共產黨員只有融化在國民黨內的才是精神團結，負荷抗戰建國重任所應取的途徑」。

記者對於張先生的主張表示敬佩，接着便是請教他幾個目前國內外的問題，因為是純友誼的漫談，在談吐上便彼此沒有拘束地。

首先談到黨派的問題

「就主義說三民主義是中國救國唯一的主義此在過去中央的宣言中已經申明確認它爲建國最高綱領，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正是一部三民主義的縮影，更應該亦誠擁護；就政治集團說，國民黨在初期的國民革命中完成統一救國的大業，在現在它更擔當民族的危難，領導舉國上下，外求獨立，內求統一，國民黨的我就和進步以及它成爲抗戰中唯一的領導中心並不是偶然的，反之，正是反映國民黨本身的力量和健全，關於國民黨主持抗戰建國大計的領導地位，這點過去中共並不否認，就領導者說，蔣先生爲全國唯一的最高領袖，中共非但不否認而且公開的表示擁護，但是中共仍然主張統一戰線，所謂「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的政黨同時並存，其反映在政體上的是政黨的聯合，但是這個戰線能不能擔負起民族國家正當危難時代的任務？這是很大的疑問，目前中國抗戰最需要的不是零碎瑣屑的抗戰意志與抗戰力量，而是需要凝合一塊，匯注一流的整個力量，統一意志，這才

是真正能夠克敵致果的力量。

「因此我本人主張最好是一個黨，論解決目前黨派問題，一個黨的辦法再具體不過了，近數十年來的政治思潮一黨政治的優越遠駕於多黨政治之上，因為兩三個主張不統一的政黨在民族國家危亡的時候便往往發生兩種不良的現象，一種是責任推諉，一種是小量的分散和抵銷」。

記者進一步地詢問到一黨政治的具體辦法是不是北伐時代國民黨容共？抑或國民黨合併其他各小黨？抑或是國民黨領導其他各小黨？

「關於形式的問題輿論界已經有不少的主張，我想這是要看事實的開展怎樣去決定，不是空洞的理論所能奏效。一黨政治的趨勢是事實的問題，國民黨爲目前領導抗戰建國的中心力量也是事實。不過我總希望，就使不能實現一黨政治，起碼的要求是不應該再有鬥爭，再有摩擦，使用來抵禦外侮的力量決不要自己抵消了才好」。

關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張先生接着說下去；

「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爲集思廣益，團結力量起見，特設國民參政會。是以國民參政會最大的作用是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因此它便是抗戰過程中政府的集思廣益機構和團結機關。我的意見是國民參政會最好不要變成一個多黨政治的議會，或是當做宣傳舞台，而應該變成一個全國力量溶化凝聚的火爐。」

「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人士，最好能夠提出具體而切實的辦法供獻當局，不要只是批評攻訐，議會政治往往易於偏重檢舉政治批評政府，但在今日的中國這種作法是多餘的。本來執政黨的任務就已經千頭萬緒，困難苦衷的地方自然很多，一定要吹毛求疵批評起來，可訾議的地方自然免不了，譬如最近聽說不少人對於政府的征兵措施，救海難民傷兵諸問題頗有訾議，其實這種工作既煩重而且困難，此在若干先進列強，他們的國家社會基礎可以說比我們進步，他們征起兵來尚且困難重重，何況我們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我的意思最好是提供具體的具辦法的意見，才是真正擁護政府。」

關於國際局勢據張先生的觀察。

「目前國際局勢最明顯的趨向，是以張伯倫外交政策爲中心的英意協定四強協定爲主，所謂團體安全與和平陣線已經因爲英意，英德，英法，法意等得相繼而來的談話內支離破碎了，代之而形成的却是新的均勢的開展，這個新局面目前尙在開展中，但對於遠東局勢無疑的是好轉有利，因爲德意日反英協定的作用的鬆懈，使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上感到孤立。」

「至於西班牙戰爭與遠東問題本來很少直接的關係，假定張伯倫外交政策果真能做到減輕反共協定的作用，無疑地歐洲局勢的安定，日本當然感受莫大的威脅，至於蘇聯與西班牙的關係本來只是對歐洲列強作一種試探性質，它的政策已在開始轉變，就形勢說於我也是有利的。」

最近託派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不經意地向他提出來。

「中國有沒有託派？誰是託派？這都是謎，據說中國有託派，並且有出版物，但有人硬派定陳獨秀先生是託派，據我所知並沒有那回事，還說陳獨秀先生是漢奸敵探，說來有聲有色，這更加無的放矢。」

「凡意見不同的，似乎沒有適當的名稱，往往以「託派」名之，這也是一種新作風。」言下頗有幽默味。

據張先生語記者，他準備在最近發表點文字。看看時間不早了，記者便告辭出來。

寫完這篇通訊，記者有一點感想，中國人生哲學薰陶下的中國人，只有公德，沒有私怨，張先生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和中共的文告上合則吹捧，不合則攻訐，攻訐不遂繼之以翻舊案算老賬的勾當，真不可同日而語。（斯維）

（二）張國燾會見記

抗戰中心的武漢，一切都呈顯出緊張紛雜的狀態。最近的刊物報紙中，繼陳獨秀是否托派問題而起的有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的事件，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張國燾，存特立，北京大學學生出身，江西萍鄉人。他在共產黨內歷史與地位不在已故的瞿秋白陳延年之下，且在李立三毛澤東之上。是共黨巨人之一。民國十六年在武漢任省委

書記。八七會議時，張隨賀龍葉挺南征暴動，不幸失敗，那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臨時擴大會議上與毛澤東同受處分，次年春——一九二八年，以參加六次大會的名義，被派赴俄京莫斯科，越二年歸國，任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最近在陝甘寧邊區中繼林祖涵而任特區政府的主席。可見其在共黨中之顯要。

四月十八日的漢口新華日報的第一版社論下的廣告欄中，忽然刊載一則「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通告，接着掃蕩報武漢日報刊有一「張國燾聲明」的啓事，說明原委及其主張。

關於這件事，據說張國燾等主張取消共產黨組織，加入國民黨，爲更進一步的澈底合作與團結；但中共中央仍主統一戰線，維持共黨的獨立。這事引起我走訪張氏的動機。

四月二十八日的早晨，趕到江漢碼頭的輪渡，當渡船的舵師聽了岸上指揮船的輪渡司事吹出銀笛之聲時，拉過汽笛，輪船離岸向江心移動的時候，江漢關鐘樓上奏了一陣叮噠之曲，是九點一刻了。

初夏的天氣，陽光有些刺人了。幽靜的武昌馬路上兩邊的法國梧桐，綠得更加可愛，那情境會使人立刻回憶起第二故鄉的杭州，人力車在曲折的小巷中顛波的拉了許多路，終在巷末的一間灰色二樓的小洋樓門口停下了。

投入了名刺，半響便被一位青年司關引入，跟他走上樓，樓口站着一位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臉孔方形而面色紅潤，頭髮有些花白，眼睛有光的四十開外的中年男子，伸出巨大而厚的手，笑着相迎。我於是向「是張先生吧？」握了那溫暖的手。面對着這位共黨領袖之一，十年間大家咒罵攻擊，現在却能握手對談，片刻間湧起了不可申說的感慨。

經過了慣例的寒暄。起初中是不住的咳嗽。

「張先生是什麼時候到漢口的？」

「這個月的三號離開廣施，十一日到漢口，」他這樣回答。我隨即問起了邊區政府。他說：「這是個特殊的組織，中央國府的法令中並沒有明白規定，可以說是『自封的』了。」這是實話，我相信並不是他對邊區的攻擊之辭。

於是談及脫黨問題他只淡淡一笑，那裏面一定含着無限隱衷吧。他說：「三民主義我承認確實是黨國今日之所必需，切合國情的建國最高原則。以黨而論，國民黨這些年來領導全國，內求統一，外求獨立，進步很大，亦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且國民黨亦是足以代表全國各階層的利益的。蔣先生辛勤爲國，確是全國的唯一領袖」。他點上了一支烟，「所以我認爲這個時候民族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參加抗戰建國工作，求民族之自由解放。因此，進一步說，關於黨的問題，有調整的必要，過去國共一度合作，不幸中途分散，未表澈底協力，造成十年來的悲離。一九·二二」中中共中央的宣言，放棄赤化運動，再度合作，促成這種合作的原因，自然在於增加抗日的力量。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種合作，還不夠密切，最好兩黨結合成一個吧」。

「是不是如外面所傳取消共產黨的組織加入國民黨裏？去國共兩黨謀澈底而永久的共同努力」？

「那是方式問題，目下各方在研究之中，只求某種方式最合理而有效就行」。

「那末中共中央方面的態度如何呢？」

「他們嗎？」他喝了一口茶，丟了手指裏挾着的烟尾。「他們仍主張統一戰線的方式，不主張兩黨合一，是我同他們根本上衝突之點。而且我以為即使不能合而為一，亦不好互相鬥爭，滅弱自己抗戰的力量」。停了一下，「他們開除我也就因此，報上已登載過了，我也不再說了吧。」

「在從前，蘇聯與外蒙出兵的呼聲很高，後來固然沉靜了，而事實上，蘇聯與外蒙至今不但沒有出兵，甚至連出兵的情勢也沒有，當初何以對問題叫得很響亮，尤其是陝北？」我說了，深恐自己的問題太囁蘇了。

「這不過也是當時一般人的希望國際援力的結果。並沒有什麼意思。至於蘇聯外蒙究竟會出兵不會出兵我的觀察是不會出兵的，因為事實上還沒有這種趨勢」。

「是國際形勢對蘇俄不利，故他不願或不敢出兵嗎？」

「照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來，第一最活躍的是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是在

安定歐局。艾登辭職以後，他的外交更積極了。從承認意國併阿到英義談話而至簽訂協定，以及最近的將要開始的英法談話，英德談話，果結如何，固難詳細測知，但是英國的目的在安定歐洲的局勢而結果可以鬆懈防共協定的力量。德意有所滿足，自然不會積極幫助日本，況且他們的協定，目的全在相互利用而已。其次則為俄國同法國的集體安全外交，所謂和平陣線外交，英國一面固然在求防共協定力量的鬆懈，而另一方面，亦在求減弱兩大陣綫對立的趨勢。這種國際形勢對中國並沒有害，反而有利因為歐陸安定，則遠東易被重視；防共協定鬆懈，則日本陷於孤立狀態。這對我都有利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業依人而成的，究竟不多，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

「至於談到西班牙戰爭，」他回答我的詢問其對西戰的觀察。「看來國民軍是會勝利的。許多人往往把西戰來同我國抗戰來作比較，這是錯誤的，因為兩者性質上根本不同。如果國民軍勝，我國抗戰也不會受到什麼壞的影響。」

這使我問起他對抗戰的意見。他說：「我是向來具有抗戰到底的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的堅強信心，且更願把自己一切貢獻出來，爲國家民族效力。」——（這時他的眼睛張得更大而眼光也更發亮了，可見他說這話是非常充滿情感的）——「我們是個陸軍國家，幾年來由於蔣先生的努力以粗具規模的軍備，來應付日本，却發出驚人的抗戰力量，魯南大捷，愈是增加我們抗戰必勝的信心。不過我們要獲得最後勝利，當然在於最後一次的大規模的總反攻，把日軍趕出國土，收復一切失地。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力量，推行這個反攻。這種準備，在軍事上則求改良軍隊的素質，訓練新軍幹部；在政治上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領導全國減輕政治上的一切磨擦，黨派上的一切鬥爭，國民黨這次臨代大會宣言中說得非常透澈了。

——同時我們知道日本國內情形，也是非常困難，最使日本感到痛苦的，便是財政問題各方面刊物報紙上說得不少了。這種敵國的內在的困難，亦即是我們必勝的有利條件。」

說到民主。他說：「各國實例，到了戰爭的時候，是政治的休戰，議院的停會，我國自然也該這樣。所以這次設立國民參政會，我的意見，不希望它變成一個多黨政治。國家中的

議會，宣傳各黨政策，發表各黨的意見，因為這是利少害多的。我希望它是戰時團結力量的中心，提出具體辦法的參政機關，一切要以有利抗戰為目的。」

因為他的談話中，屢屢提及團結，我忽然想起共產黨中常常鬧的托派問題，尤其是最近的過去，對陳獨秀是否托派問題，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他說：「托派只是少數幾個人的小組，因為理論上就得不到同情，故也沒有什麼力量。陳獨秀先生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漢奸，有些人往往因為人家與我意見不同，便加以托派之名，是不大妥當吧。」

「總之，」這是他談話的結論的開始，也是送客的開始了，於是準備辭行，一邊聆聽他的尾語。「今後惟有團結救國而已。」

在樓頭又握了他那厚大的右手。

（詠平）

四 各方評論

張國燾脫黨問題公開以後，各評面都有評論，茲採錄雜誌文章十篇，以覘一斑。第一是

抗戰嚮導第五期上曉江君的短評，作者對共黨內部門爭情形，似乎很熟悉，故寫來頭頭是道；第二是民意周刊第二十期上一個青年讀者寫給該刊編者的一封信，足見青年愛國愛國之心切；第三是血路週刊第十四期上的張案面面觀，是事實報道及讀者意見的彙錄；第四是抗戰嚮導第七期家禾君的由共產黨的內闕說到張國燾的脫黨；第五是青年前綫第九期上宋子元君之共產黨爲什麼要開除張國燾；第六是國魂週刊第九期上薛達泉的讀了張國燾的敬告國人書；第八篇是民心第八期徐詠平之張國燾脫黨問題之我觀；第九篇是血汗週刊第九卷二十二期黃恩沛的讀「張國燾告國人書後」；第十篇是抗戰嚮導而八期張滌非的讀「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後。

(一) 張國燾去矣

本(四)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登載中共中央啓事一則，內容是：『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其中歷數張氏的罪狀有四：(一)「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二)「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採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

但他仍然毫無改悔，最後竟以書面聲明自行脫離」，（三）「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爲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行成立僞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四）「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總而言之：「這是張國燾歷年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爲鞏固黨的鐵的紀律起見，決定開除其黨籍」。

在此堂哉皇哉的公佈之下，中國共產黨的「老布爾色維克」（？）張國燾被「開除」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張國燾被驅逐了！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張國燾被判罪了！這是繼陳獨秀先生之被罵爲「托匪」和「漢奸」，李立三同志之被斥爲「半托洛斯基主義者」以後共產黨內部一幕重大的醜劇！

張先生！你知道嗎？這就是齊諾維埃夫、加米尼夫、布哈林輩所嘗試的滋味，你幸虧「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來了，沒有像夏曦、段德昌等一樣，做肅反委員會祭壇上的禮品，應該感謝主耶和華爾！你反省吧！如果你過去也這樣對待過你的政敵，那便是天道好還呵

！你看：你「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還不應該「開除」黨籍嗎？你「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總路綫表示不信任」，「還不是一「托匪」的行爲嗎？你在「西安事變時，……主張採取內戰方針」，還不算「漢奸」嗎？你在「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鬪爭，並自成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還不叫做「反革命」嗎？這就是你十多年革命的代價呵！第三國際拿盧布以養你，你無一德可報他，滾！滾！滾！滾！滾！滾！滾！滾！

然而，張國燾却說：你不可相信中共中央一面之詞，要看看我二十四日在「掃蕩報」上面登載的啓事，我曾聲明過四點，其中兩點是值得你注意的，那就是：（一）「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二）「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惟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

當領應即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果真如此，那就證明你張國燾不僅沒有一「破壞全國抗日團結」及「對（共產）黨的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而是一「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必須）達到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但，你主張怎樣作「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呢？是不是和我們的意見一樣，提議解散共產黨、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做實現三民主義的工作呢？照你的意思看來，好像如此。若是真的，那我就舉起大拇指來稱讚你一句：同志！對的！「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要「和國民黨共同建國」的共產黨，在政治上已經失掉了靈魂，還有什麼獨立存在的必要呢？你有此覺悟，不失爲有見識一點的「老布爾色維克」，比之純用烏克蘭白麵包養大的好漢——陳紹禹，秦憲，張聞天等，畢竟是一「鶴立雞羣」啦！

共產黨的一小同志——你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兼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張國燾同志已經覺悟了，你們還不應該跟着他的後面誠懇地走到國民黨三民主義的

旗幟下來嗎？「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黨內經過了許多勾心鬭角的鬭爭，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且以其十餘年來學習得的一些政治理論作觀點，看出了共產國如不與國民黨作「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必無前途所使然。你們不要相信你們中央所說的什麼「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必然結果」的謊言了，須知張國燾的政治水準比你們要高超得多、鬭爭經驗比你們要豐富得多、所知的事實比你們要詳細得多，如果你們中央的路線沒有錯誤，他還會「不滿與懷疑」嗎？反省呵！宗教的信仰；決不是無產階級的忠誠；感情的盲動，決不能成就革命的事業；張開你的眼睛、沉潛你的頭腦，武裝你的思想，留下你的性命，認識了中國社會，再去幹你們的革命事業吧！這便是我貢獻給你們的忠言。

曉江 四·二四·

——抗戰嚮導第五期抗戰餘論第二則

(一)關於張國燾問題

編者先生：

在本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上，登載有如下一段「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啓事。（略）

這段文字在我們教室內發見以後，研究與討論即隨着展開，經過幾位比較明瞭中共歷史的同學參加意見，並供給資料，所得的也很有限。我們只知道張國燾字特立，曾受過高等教育，爲中國共產黨內有數的知識分子，並且是最早的負責人之一，與瞿秋白等齊名。民國十六年任武漢省委書記，尤其有作有爲。是年八月十七日，在中共黨史上所謂結束第一次派別鬭爭的八七會議，張適隨賀龍葉挺出征，任革命委員會農工委員會主席，賀葉失敗，張與周恩來等亦大遭中共之詬誶。旋被派出席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即被扣留。是時，張與毛澤東以不執行中共命令及工作錯誤分別遭受嚴重處分，均開除中央政治局職務。嗣又

被釋返國，任全國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及江西瑞金赤軍被剿西竄，初無目的地，到達四川後，因又不能立足，張主南下，毛主席北上，經多日劇烈之爭論，結果是北上派佔勝。此後張在中共中央，僅備位而已，實則嚴被監視。

幾經反復研究，關於中共通告內所請「反黨反中央鬭爭」等等，始終還是不甚了了。今天，在另一報紙上又看到張國燾的聲明原文。（略）

於是張國燾事件的研究，又在我們同學中起了熱烈的討論。就中共決定書來說，「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對抗日民族統一總戰綫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的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似乎都非事實，而且是恰相反的」「增進抗戰建國力量，」「促進統一團結」呢！張氏聲明的四點，態度也很光明，很誠懇。我們青年的心理，很希望全國任何黨派，加強團結，一致抗戰，當然也很熱烈地希望中共對張氏的四項主張加以考慮。如果中共對「統一戰綫」有「遺憾」之處，自然也是抗戰力量的損失。

依我們淺薄的研究，張氏過去與中共中央其他一部份負責人有不甚融洽之處，但十年

來中共內部同樣的情形很多，這種舊賬是算不清的。「鐵的紀律」似乎有時應顧到「民族國家至上」的前提才好，

但另外也有一位同學說，這種現象便是張君勵先生所說的：「吾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已往的歷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衝破了階級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縱斷能衝破階級的橫斷，却未有階級的橫斷能推翻民族的聯合。」依他的說法，似乎陳獨秀事件張國燾事件等是「不是偶然的」，是民族革命發展的「必然的結果。」不知道這種分析對不對？

我們爲統一抗戰懷抱了極高度的熱誠，希望 貴刊對青年的意見，予以發表的機會，以求社會指正！敬致國民革命的敬禮！

黃國光四月二十三日

——民意周刊第二十期

(三) 中共要人張國燾案的面面觀

據說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中共從前有兩大要人，就是所謂「南陳（獨秀

（北李（大釗）），張國燾在北方坐着第二把交椅，李大釗死後，並代之領導北方黨務，卓著聲譽。一九三〇年前後，在俄國參加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回國後與徐向前關係頗密。此次被共產黨開除黨籍，我們認為那是中共的內部問題，無足重視；但為保存這一段名貴的史料，並使讀者得一整個的概念起見，故特搜輯有關係的材料，編輯這篇『面面觀』。

一．一個驚人的公告

在本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上，登載有如下一段『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啓事：（略，已見前）

二．張國燾的聲辯

隔了兩日，武漢報紙上登出張國燾的聲明文：（略，已見前）

三．偵探案一樣的故事

大約是中共中央覺得對於張國燾的聲明有答辯的必要，所以中共負責人陳紹禹周恩來秦

博古等三人，在其答覆『子健』的信中，公布了開除張國燾的經過。茲將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全部轉載於下：（略，已見前）

四·爲張叫苦向陳冒火

適在昨日，我們接到一位讀者來論，內容是爲張國燾先生叫苦，而向陳紹禹先生等冒火。原題「關於張國燾來武漢」，其全文如下：

「四月一日，我到延安，張國燾先生還在城南的窯洞裏，承他以陝甘甯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資格，接見一次，談了三四小時話，我對他的印象是：和藹可親，眼光敏銳，思想正確，不愧爲一革命的領導者。

「十九日我回到武漢，二十二日正在屋子裏整理稿子，忽然有位朋友來告訴我，張國燾已被開除黨籍，主要原因是私自離開延安，跑來武漢。他並把一張新華日報拿給我看。我當時很替張國燾叫苦，因爲一個不顧生死，爲共產黨苦鬥了許多年，地位已「政治巨頭」的

有力戰士，竟這樣的被輕易犧牲，實在有點太慘酷了！

「今日下午二時，因為躲避敵機襲擊，我到了蘇俄的塔斯通訊社，一位朋友正在研究新華日報上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人復子健的信，我也順便看了幾眼，可是這一來，我的感覺，已不是為張國燾叫苦，簡直是要對陳紹禹等冒火了，猶如我對敵機的襲擊冒火一樣。

「張國燾是陝甘甯邊區政府的代主席，共產黨既然說陝甘甯邊區政府是統一的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即應承認張國燾是隸屬於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地方官吏，一個地方的最高官吏，為什麼不能來武漢向中央當局有所請示呢？張國燾一來武漢，中共中央即以「擅離延安，私來武漢」的罪名，開除張國燾黨籍，這不是說明了陝甘甯邊區政府，依然是共產黨的政府，依然是割據自雄的政府，依然是與中央處於對立地位的政府，依然是關起門來不讓官吏與中央政府接近的政府！在統一戰線的聲浪被共產黨高唱入雲的現在，共產黨竟仍有這種舉措：是不是正妨害了統一戰線，破壞了統一戰綫，有意分散和削弱抗戰的力量！？」

「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說要自由，要民主，張國燾的地位，在共產黨中是最高領袖之一，

在政治上是邊區的最高長官，今竟因不任八路軍辦事處，不和周恩來同行，坐了非共產黨人的汽車而獲罪，這是否說明中共中央連人類最基本的身體自由和行動自由都給剝奪去了！張國燾提出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應高於黨的利益，國共兩黨應做到精誠團結的地步，可謂切合當前的需要，不料中共中央不但不予採納，反而認為思想動搖背叛了黨，突然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這是不是又說明了共產黨本身根本就不民主！共產黨本身根本不民主，却偏要在敵當前的時候，和國民黨爭自由講民主，這是不是又說明了共產黨有趁火打劫的嫌疑！？

「張國燾在啓事中，明明說他對抗戰前途甚抱樂觀，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極端信任，陳紹禹等却偏偏拉出一些張國燾主張內戰的舊賬，企圖挑起國民黨員對張國燾的仇視，斬斷張國燾向中央投效的機會，這不僅沾污了一個政黨的政治道德，而且有逼人走上絕路的嫌疑！（原景信。四月二十九日晚於漢口）。」

（記者）

——血路週刊十四期——

(四)由共產黨的內鬩說到張國燾脫黨

熟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一定知道陳獨秀、惲代英、蕭楚女、李立三、張國燾的名字。蕭楚女先生早忠於他的信仰而死，惲代英先生爲盲動主義所犧牲，李立三到莫斯科自認爲「半托落斯基主義者」，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先生則以高齡受「匪」和「漢奸」的侮辱。最後，依四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所登中共中央的啓事，張國燾氏亦被其開除黨籍！

歷史常常走重覆的路，但從沒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演變的迅速。俄羅斯的老布爾塞維克，個個蒙着不名譽，成爲黃泉的冤鬼；中國的老布爾塞維克，也很難有所例外。自己所造的黨，或由於官僚制度之騎在無產階級的頭上，或由於無產階級運動的衰落，充當自己的劊子手。雖然是十八世紀使人發抖的雅可濱專政，也沒有現世紀「共產黨專政」的殘酷。主耶和吶華，救救他們的靈魂吧？

中國共產黨自牠的階級基礎由產業工人轉變爲農民，手工業者和流氓的混合以後，就早

否定了牠自己。從自我否定之中共身上絕對聞不出馬克思主義的氣味，只溢着人民意志派與巴古寧主義之混合的惡臭。適應階級基礎的轉變，是領導權的移替。當農民意識臭味的分泌發達時，殘留黨內之代表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幹部，必受新領導者的屠殺。屠刃出鞘，早晨是堂上，午後變為階下囚。這些人，用血和肉染污了自己的旗幟。代表新階級的領導者，則用這血糟的旗幟製造勝利的冠。這並非我們的杜撰，凡讀過方志敏「遺書」的人！均會說同樣的語言！

任何大罪惡，却在善良的名義下進行，中共自我否定後之毒殺國族的盲動，也有牠的迷人字句，那就是「土地革命」。關於這個革命之反歷史的設施，容我留在「十年的新雅可賓專政」中去批評，而破壞農村生產力的「查田」和「分田」運動，必然促速割據區域內經濟的衰落。封鎖和戰爭，是更加衰落的推動者。到底由於經濟的無出路和農民意識的反映，在「中共」的上層中，分成許多集團。如果在這些集團的頭領中，不立即產生出白衣秀士的玉倫，那猜忌和陰謀的空氣，必然瀰漫於彼此的腦海中。

在大風暴怒吼的前夜，彼此雖然面孔却裝着鎮靜的笑容，雖則口裏却親密地呼喊着一同「志」，而一切卑劣的手段，則各隱藏於跳躍的心房中。大家都有這個感覺，彼此都在算計。若使勢力是均衡，不能用流血去解決，那就須各找外援。他們的外援，就是列寧爲牠流淚的第三國際。欲得這個國際的援助，不能不各掬肺肝相示其忠誠。如是，謙虛、忍辱、賠不是和挨罵，變成中共頭領禮拜式的課程。但白臉皮高鼻子的該國際指導者，總不因那些人的奴顏卑膝而放心，結果，受米夫喂養長大的陳紹禹和秦邦憲們，由崑崙山之西來（見「生活在延安」，充當「中共」的國際格柏烏。）

大家並不因這一着而有所覺悟，反更各植自己的勢力。「紅軍」的支配權，英雄的崇拜，成爲明爭暗鬥的對象，成爲宣傳的手段。誰握有「紅軍」，誰就成爲英雄。英雄本就是小資產階級精神上的救主，雖然彼此已被迫走到歷史的懸崖之上，絲毫並沒有放棄上述的野心。結果，第三國際的格柏烏取得了，井崗山的混世魔王統治了軍。兩手空空的人們，則過着兩面逢迎的生活。

盧布和槍桿，開始了睥睨。這一幕的悲劇，誰都聰明地不敢充當主角，但各人還是成竹在胸。那就是改寫各人的歷史。握着黨權的人，捧着「舵師」與「導師」的長生牌，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並把自己的「奮鬥」記錄，裝飾成連老友也不知其爲何許人；掌着軍權的人，用創造西游記的精神，以表示自己只有唐僧的忍耐，兼具孫悟空的本領。但依人鼻息而左右逢迎的老黨員，如非「看不過眼」，便似兩姑之間的媳婦。

張國燾氏，自軍權爲毛澤東取去後，如不甘雌伏。則當思雄飛。回顧二十載的生活，蹤無不勝今昔之感，而曾戴着蘇維埃副主席帽子的黨員，一定還有跳躍的良心。良心使他揚棄現階段，但經驗却使他陰沈。周圍都伏着刀斧手，步趨都須細留神。結果，賴其祖宗之靈，乘大家的視線爲民族戰爭所吸引，利用黨與軍之公開的赤裸裸的「轉變」的環境，溜到人世來。

地獄和天堂有嚴格的界綫！誰願意再由人世重返地獄？成千成萬「同志」的屍體，在他的眼前閃動。他知道中共的蜜口，藏着利刃。人生世事如春夢，暫留老命渡殘生。於是，他

爲「新華日報」廣告欄的材料。

這就是張國燾被開除黨籍粗描的線條。

張國燾被開除黨籍，陳獨秀被誣謗，給青年人知道，中共已是一個中國歷史之諷刺的妖魔。如果不把這位將中國歷史再開一次大玩笑的撒旦埋在黃土裏，那麼，當整個國族再見到這「紅無常」的出現，必大倒其霉。

此後，我們將聽聞這陰謀的集團，有更大發展的報道。紀律已不是禹應膏藥；再引起屠殺，將是唯一全能的上帝。張國燾的餘黨，不可避免地成爲「耶路撒冷」（延安）屠場的祭品，盛貯這些可憐犧牲者血肉的器具，上面一定插着「托匪漢奸」的標條。在「祖國」，殺托派千萬人的耶哥達，能夠變爲統治者口中的「托匪」，在延安，張國燾的「餘黨」之插縛「匪奸」的白條，那何足外人掛斷！

在狂熱的民族戰爭中，如有這樣的一幕，很使自由主義者賤賣他的眼淚。但虎口的張國燾先生，應該認識中國的歷史。請拋棄過去可使悲感交集的陳跡，贊助中央爲現階段流建立

新民族國家的一滴汗吧！

(五) 中國共產黨爲甚麼開除張國燾？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巨頭，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歷史很深，地位也極顯要，最近突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據中共中央公布的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所述，是因爲「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此次不僅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露綫表示不信任，……」是關於他過去的罪惡既不在過去予以處分。在這裏不過是作陪襯的，其實這次構成處分的主要罪過，就只是「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露綫表示不信任……」。而張國燾在自己的聲辯中也承認對於這一點是不大滿意。他說：「……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感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的綱領，應卽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

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由此看來，張國燾的被開除黨籍，雖然在中共中央的立場說，只是一種懲罰「機會主義者」整飭黨紀的措置，然而事實的究竟却是共黨內部政見衝突的反映。這件事雖然只是中共的內部問題，不過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共自發表「九·二二」宣言後對於抗戰建國所持的意見和態度，加深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所以不是不值得注意的。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因為我們民族國家命運的危殆，激起了國人一般的覺悟（不幸這覺悟還沒澈底），而有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熱烈要求，蘆溝橋事變以後，一切素日反對中央政府的黨派和勢力，這時受不了輿論的指摘和良心的自責，乃開始自動的向國民黨輸誠合作了。共產黨也就在去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正式表示願意在國民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爲了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作復興民族運動的工作。並且他們爲了「取消敵人的陰謀之藉口」，爲了「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在宣言中鄭重地向全國同胞聲明決遵守下列四種諾言：（一）擁護三民主義；（二）取消一切推翻國

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管轄。我們處在這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對於共產黨這樣犧牲黨見效命祖國的表白，該是何等的高興同情和期望啊！可是八個月來事實表現的是怎樣呢？這就不免使「一切善意的懷疑者」始終是懷疑了。我們只要看看中共的機關刊物——「解放週刊」上的言論，就可知道共產黨現在是如何的野心勃勃，同時也就可以明白張國燾的主張是必然要遭受排斥和譴責了。

「解放」第十七期（此期係該黨發表宣言後之第一期）共產黨領袖張聞天（洛甫）的一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文中，很坦白的這樣說：「……共產黨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可能在全國宣傳自己的主張，……還不能在政府中爲實現自己的主張而公開奮鬥」。共產黨既已宣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那麼爲甚麼還要宣傳自己的烏主張？爲甚麼還要「爲實現自己的主張而公開奮鬥」？

「解放」第二十四期「中共陝省委第二次談話」中還有這樣的說法：「……省黨部（指國民

黨）負責人談話，謂本黨中央九月十二日的宣言，承認放棄「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又謂本黨『要擁護中央一切國策，服從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的一切領導』，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這共產黨之不願放棄階級鬥爭，無誠意擁護中央政府 和蔣委員長，在這裏自己寫下口供了。

此外他們還常用與日寇及漢奸同一的口吻。稱中央政府爲「南京政府」，並稱第八路軍以外的中國軍隊爲「同盟軍」，殆無異看作自己不是中國人，而且看作是與我國民政府立於對衡地位的一個勢力，其欲保存自己的武力以圖割據自雄，是最顯明的了。

共產黨整個認爲他自己的一套板眼是對的，那還爲甚麼要來一個「九，二二」的違心之論呢？如果說「九，二二」的宣言不過是高興時隨便說來逗我們玩玩的，那麼拿這些正在呻吟喘息於敵人鐵蹄下的民衆來開玩笑，不是太混蛋了嗎！

張國燾就爲着不忍欺騙民衆，爲着要澈底解除民衆的懷疑和憂慮，所以主張應把所開的「九，二二」文票給他兌現，應拿事實表現給人家看。可是這未免太傻瓜了，太不顧己黨的利益

害了，所以他得不到同志們的同情，而且因此獲罪了。

張國燾認清了「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並且深切了解只有忠於這種認識，實踐這種認識，才能達到抗日民族革命成功的目的；所以主張取消共產黨組織，與國民黨合併，爲更澈底的團結與合作，並且他以爲「即使不能合而爲一，亦不好互相鬥爭，滅弱自己抗戰的力量」。中共中央雖亦承認上面三點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爲着要保存共黨自己的歷史，却不能犧牲共黨的獨立，所以他們只是高興「團結」，而不願談「統一」，要統一也只能給你一個「統一戰線」式的統一。張國燾個人是「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的，而中共中央似乎是認爲中國沒有了共產黨存在，國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值得擁護了。這實在是陷入了章乃器——一位救國選手所說的嚴重錯誤：「在這民族歷史都要被斬絕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民族的歷史，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歷史；在這國家生命要被殺害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國家生命，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政權。倘使同在敵人的刀口底下，還有人

要回憶到過去的歷史，顧慮到將來的政權，那就要變成自私自利的愚夫！」

由前面所說看來，這次張國燾之受開除黨籍的處分，表面的理由雖是在於他擅自掛冠脫離「陝甘寧邊區政府」——一個未經國民政府明令規定的「自封的」（張國燾語）特殊組織，實際上則是爲了他叛棄他的主張——不履行「九，一二」諾言的主張，太不和同志們沉澀一氣了。這點張國燾自己已經說明：「他們（指中共中央）仍主張統一戰線的方式，不主張兩黨合一，是我們根本上衝突之點」。

張國燾爲求「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不惜任勞任怨，把他的責任一肩扛起，然而他所獲得的報酬，不過是深使他痛心的黨的制裁，和「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的罪名而已。他是被犧牲了！不過有一點使他稍稍得着安慰的，就是他還沒有和陳獨秀一樣蒙受「托派」「漢奸」的誣蔑。

（六）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薛達泉

要是我們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的話，則際茲中國遭遇空前的外患時，惟有舉國團結，精

誠團結，以統一的意志，齊一的步伐來致力抗戰建國。所以我們覺得什麼黨派問題，什麼政治主張，得這一潰一敗，即亡國奴種隨之的今日，實是滄一粟的太渺小了。民族危機的嚴重，其程度太超越這些問題了。因為做了中國的國民，這時不團結，這時不報國，更待何時？這個時候還沒有放棄成見的氣量，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心胸，簡直是甘心亡國奴種，做什麼中國的國民呢？因此，關於過去的各黨各派問題，以及最近的陳獨秀是否托派問題，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的事件，我們是都不願有所論列。這因為國人並不會愚昧到像故意歪曲宣傳的那樣想像的不辯是非和事實。在這民族遭過大難的關頭，中共是怎樣的報國，我們相信國人是都明白得很的。

日內讀到了張國燾的敬告國人書。張國燾是中共一人，他過去在中共的地位，以及他此次被中共中央開除的經過，在有些報上已經登載過，不復贅述。在這裏我們是要說一說，讀了這篇告國人書後所引起的感想中共離開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路線，是有十年了。說到這十年來的化離，是嘗過二萬五千里的流竄。要是不演變到中央的圍剿，或者竟是早早回

頭，「願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的話；則全國心力物力，集中在全國，而今日的中國，亦許不是這樣的中國，換句話說，要是俾中央早日以安的力量，專務攘外的話；則今日的統一，亦許不會使國人還感到這樣的微薄；今日的國防，亦許不會使國人會感到這樣的單弱；其統一的力量，國防建設，亦許足使敵人不敢這樣無忌憚的侵略我們，欺侮我們；雖則這次民族抗戰，爲國民革命第二期所必經的階段。同時，這十年來不能使中央早日以安內的力量來專務的攘外緣因，固然並不這樣單純的祇是中共。

因此，中共如果是忠情謀國，以昭並不是「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的大信於國人之前的話；則張國燾提議的真誠擁護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取消邊區政府；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實踐中央的外交政策三點，應該早就這樣的做去，不應該到抗戰九個月來，還因了這種意見的紛歧，而演成內部的分裂。的確，唯有這樣做去，纔是「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纔是真誠地「願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努力」；亦唯有這樣做去纔可昭示共

赴國難，取信國人。我們所以談談在這民族遭遇大難的關頭，中共是怎樣的報國，我們相信國人是都明白得很的，

(七) 張國燾脫黨問題之我觀

徐詠平

(一)

四月二十日漢口新華報廣告欄中，登着一則「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啓事。這啓事一直登載了好幾天，因為是本文中重要的文獻，故錄原文如下：（略，已見前）

這啓事登載以後，四月二十日，張國燾在掃蕩報登聲明啓事一則，茲錄如下：（略，已見前）

對讀了這二則通告與聲明之後，我們深深感到這決不是張國燾個人的脫黨問題。試把張國燾的聲明，詳細觀察一下，便可知道。

(二)

張國燾在共產黨裏是個有地位的黨員，黨齡極長，加入共黨的最早份子，與瞿秋白等齊

名，地位不在毛澤東下，且爲中共中央的第一屆中委，曾兩度派赴留俄，最近在脫黨前擔任邊區政府的主席。這樣看來，張國燾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正如他自己聲明「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驟然看了雙方面的文字，如誤認爲共黨內部黨員的黨籍問題，便大錯了，這問題事實上並不這標簡單的。因爲第一點，張國燾在黨內的歷史之久，地位之高，決不會這輕易而草率開除的，反過來說，張國燾必有其堅決的信心，才會離開關係極深之共黨，決非偶然之事，也可以想見的了。其次，共黨過去開除黨員，對外向不公告，——不管爲向外人說明原委或是在求各方同情——即使共黨的老頭子陳獨秀之被開除，亦只向黨員公告其開除黨籍決定書，沒有有像這次般如此昭張的。可見此次事態之嚴重。

就張國燾的聲明書看來，他的主張：

(一) 抗戰時期，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二)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三) 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中

正先生爲全國最高領袖；

(四)統一戰線還不夠強調，中共中央對中國民黨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應卽有更懇切之響應，以達進一步的精誠團結，以增加抗戰力量。

而中共中央「九二二」公布的國共合作宣言。及其前後所發佈的文字，對前三項自然沒有反對，其所爭持的是第四項。中共中央仍是主張統一戰線，而張國燾則不主統一戰線，而主張更進一步的團結。

所謂不主張統一戰線，就是反對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共產黨叫出的口號。什麼叫統一戰線呢？「七二二」的中國共產黨爲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中有極詳盡的解釋，是一以國共兩黨的合作爲基礎，團結一切抗日救國的黨派，創立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這句說分析起來，則可歸納到三點：

1. 中共兩黨互相合作，此種合作爲抗日救國之基礎；
2. 一切黨派凡是救國抗日的，團結在一起；

3. 這樣成爲一條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

這簡單明瞭的說，就是把中國政治，變爲多黨政治。張國燾則不如此主張即反對這樣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多黨政治，——他主張更進一步的團結。他說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那就是非三民主義之主義是中國今日之所非必需的了，凡物既非必需，便該在取消之列，或者暫擱一旁，那末共產主義無疑是非必需的主義一。凡一政黨必有其政綱，產生政綱的是政黨所崇奉的主義。今共產主義既不是今日中國之所必需，那末共產黨自然在取消之列。共產黨既然客觀上失其存在的條件，則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一民族統一戰線，當然不能成立。所以明白的說，張國燾認爲共產主義非中國今日之所必需，共產黨不能單獨存在，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民族至上，需要更進一步的精誠團結，在「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之下，共產黨仍要回復到這個中心裏來，每個共產黨員，都成爲國民黨主義所陶冶成熟的忠實同志。

把共產黨融化在國民黨裏去。

以在共產黨裏有歷史有地位的張國燾說這樣的話，其爲中共中央所含恨者可知，故受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張國燾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思想，在主觀上說，自然是由於他思想上的轉變，在客觀上說，必定由於實際環境，使其思想轉變，信仰改正，終至毅然脫黨。

中共中央的通告中，說：「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據我們所知道，南昌暴動之際，張國燾奉派爲指導員之一之後，與毛澤東同受處分，因爲犯有機會主義的嫌疑，並派赴俄京，越年歸國，任全國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瑞金擊破，長征到川，有南下北上之爭，張國燾主南下，毛澤東主北上，結果是實力派的毛澤東勝利。故曰「其最著爲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僞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因爲同情南下的人都以張國燾爲中心，一致主張與中央政府聯絡，聽命中央，但北上派主張打通國聯路線，與蘇俄聯合。結果張國燾的主張被推翻了。」

但是客觀的環境，——中國的經濟現狀及政治特質與夫人民生活狀況——使張國燾先則懷疑共產主義的實現之可能性，抗日戰起後，終使認清了中國目下的實際需要，放棄他信仰了近來二十年的共產主義，脫離了關係極深的共黨。

爲什麼呢？

就中國的社會情形來說，中國在政治上，需要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統一全國，消滅封建殘餘勢力，外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求中華民族永久自由獨立解放！故我們所需要的是全民的族革命，不是階級鬥爭，是全民政的民治，不是無產專政。中國在經濟則需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因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是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只是生產不足，不是分配不當。關鍵在如何增加生產而已。

這是很顯明的事實，張國燾的學識與經驗，使他澈底覺悟。我們相信共產裏像張國燾般的認識與見解的人，一定不少。這是時代的趨勢如此之故。

抗戰需要勝利，勝利必先自統一，現在統一的基礎已經穩固，只剩下了政治上的黨派

問題。

張國燾的脫黨是這問題即將解決的先聲吧。

讀張國燾告國人書後

黃恩沛

抗戰爆發，全國一致對外，十年來與中國國民黨站在敵對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幡然改圖，於去年九月廿三日毅然決然發表北赴國難宣言，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取消暴動政策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爲鞏固民族的團結，抵抗強敵的侵略，這種光明磊落的自覺的宣告與行動，的確獲得同胞們的贊許。誠如 蔣委員長所說：『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這不祇是國民黨人對中共期望，全國同胞對中共也同抱這樣的期望的。

但，可惜很，在所謂一國共兩黨關係迅速確定和增進一中，中共的言論行動的確不能盡

如我們的期望。無謂的磨擦與誤會，接二連三地發生，甚麼建立國防政府呀，我們需要民主呀，建立包括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呀，階段鬪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呀，種種式式，無非是想借機會來爭取領導權的一套；這，當然會影響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而與中共的救國初衷適相反的。

又自『中國共產黨的策略路線』一書被發現後，雖然經過中共負責人周恩來否認是中共印刷品，指為偽造，然而根據數月來中共小伙伴們一貫的言論，不能不令人始終是滿腹狐疑。最近，中共的重要份子張國燾開除黨籍案發生，舌劍唇槍，於是更惹起社會人士對中共的注意。在張國燾告國人書裏，張先生本自我批判精神，檢討中共政治路線的錯誤軸心，懇切地忠告中共同人，儼然自悞，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的錯誤。本愛國之熱忱，為赤誠之披瀝，我們對張先生實抱深切的同情，而於其思想正確，態度光明之處，尤為敬佩。相反的，對於口口聲聲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中共，就不免越發覺得有點失望了！

我讀了張國燾告國人書後，有點感想，為着鞏固民族的團結，增強抗戰的力量，似乎無

妨坦白地吐露出來。不過，先來一個聲明，我的說話完全出於善意，希望中共負責人不要誤會；否則，與我發表的意念恰恰相反，增加無謂的誤會，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今日，是絕對不應該的。

一 「思想自由」與「民主」祇是一個口號

在國內許多共產黨主辦的刊物裏，常常喊着「思想自由」「民主」的口號，似乎是向政府要求「自由」，要求「民主」。我們以為大概邊區一定很自由很民主的罷，未到過「陝北聖地」的人都這麼想。而此次張國燾脫黨案，都事實證明所謂「自由」「民主」祇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以張國燾在中共的歷史看來，他是共產黨的老前輩，是共產黨中的領袖人物，而且担任着邊區的代表主席的重要職務，因為中共中央負責人政治主張不同，正待商討中，就突然被加上了一「擅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的罪名，開除黨籍，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中共負責人還說他到武漢不肯住八路軍駐漢辦事處，不和周恩來同行，私自搬家等等為違反了黨員應該遵守的起碼的黨的紀律，黨的紀律原來連居住自由行動自由都要剝奪的！還可以說「思想自由」「民主」

嗎？那麼，所謂「自由」「民主」，畢竟是一個別有作用的口號罷了！

二 邊區政府應否存在？

未到過邊區的人，無從知道它的真實狀況。但據張國燾告國人書所說：「陝北邊區則視若外人租界，封鎖尤嚴……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我完全同意張先生這番話。以不久以前還是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先生，說出這番話來，坦白地承認這是割據式的特殊政權，相信是鉄一般的事實罷。國家政權應該統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中共既誠意擁護中央，服從領導，軍隊可以改編，爲什麼偏偏還保留這封建式的割據式政治組織？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許多人都覺得這種畸形的政治組織，影響到國家的真正統一，說甚麼鞏固統一戰線雖千百遍，還不如在行動上擁護統一來得高明，行動上的表示，首先就要把那畸形的割據式的邊區政府立刻取消。中共中央處處以「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爲前提，我相信，當然會這樣做，不致令人失望的罷。

三 中共政治路線的錯誤

中共政治路線的錯誤，源於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沒有深切的瞭解。張國燾先生告國人書裏已經說得明明白白，無待贅述。因為治路線的錯誤，堅持小組織的利益，仍存派別成見，其結果致「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如果這句話是真的，我們不能不怪中共對於共赴國難宣言所說的是缺乏誠意了。

在中國負責人也許會這樣反駁：中共的政治路線並沒有錯誤，在歷次的宣言已經說得很明白，擁護三民主義，自然放棄階級爭鬪的主張，怎會強調「階級鬪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可是據我們所知，在「國共合作」之後，在中共宣稱為三民主義而奮鬪之後，邊區政府教育部的政治常識課本，用以教授農民的，仍然有「目前國民黨的政權，還是過去的一黨專政的反革命性質的政權，軍隊也是舊的，鎮壓革命的軍隊；所以迫切的需要徹底的來改造政府軍隊。」「國民黨的反革命的三民主義」「要求得將來共產主義的實

現，首先必須採用革命的三民主義來澈底的求得抗戰的勝利。」等等辭句。這顯然是反動的思想，反動的宣傳。口口聲聲要擁護三民主義，又把三民主義分成兩個：一個是革命的，一個是反革命的，難道二民主義有兩個版本？歸結起來還是需要「共產主義」，這還不是亦化宣傳嗎？自欺欺人，仍然不免，我們真是不勝惋惜！這樣的『政治常識』，源於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無可疑義的。

四 中共的存在問題

從客觀的環境，與事實的教訓。證明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中共也要放棄其主張。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那末。以共產主義爲靈魂的中共組織，已經失掉了黨的靈魂，本來，是根本有存左的必要。但。我們不必斥斥計較於這些，我們以爲如果各黨各派能夠真心誠意的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就算各黨各派依舊存在。也無妨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所以中共的存在。我們是不反對的。不過我們以爲中共領袖如果有更深刻的認識。更遠大的眼光。則與其保留中共的存在無寧把它取消而加入國民黨的對於國家民族當更有偉大的貢

獻。既然衷心承認三民主義爲今日之必需。國民黨是中國的民族政黨。居於領導地位的黨，何不索性加入，集中優秀分子，擴大革命力量，爲『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而向前邁進，使革命的任務早得完成呢？中國同人如果有這種更進一步的自覺，在國民黨當然是十二分歡迎的。我們希望中國領袖們深切攷慮。

五 向中國共產黨員進一忠告

中國國民黨員對於中國共產黨員，認爲是中國革命戰線上的誠摯的同伴。親密的攜手，以奔向革命的坦途，爭取抗敵的勝利，爲今日兩黨黨員的共同任務。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向中共黨員作一忠告：爲着革命的任務，愛國的熱誠，再不容許言行不一的言論行動，尤其不容許反三民主義的反政府的反領袖的言論行動。共產黨員讀了張國燾告國人書後，應該深自反省其過去的言論行動，有沒有違反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沒有走入了錯誤的政治路線，而作了私人或小組織的勾當。應該更進一步澈底認識中國革命的特質，與中國革命的途徑，放棄成見，虛心探討，爲鞏固統一戰線及民族國家利益前途着想，以至誠的態度實踐中共的

宣言，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希望中共黨員接納我們誠摯的忠告。

(汗血週刊九卷二十二期)

其二

讀「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後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很老的領袖張國燾先生已經脫黨了！這在「張國燾去矣」及「由共產黨內闕說到張國燾脫黨」兩篇短短的餘論中，業經加以分析，根據張先生在「掃蕩報」上發表的聲明看來，我們已斷定他的意見是：「和我們一樣，提議解散共產黨，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做實現三民主義的工作以達到與國民黨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纔「以書面聲明自行脫離(共產)黨的」。

但，在未看到張先生繼續發表言論之前，還不敢完全肯定。現在，事實已經給我們證明！張先生繼前(四)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登載的「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先生答覆子健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之後，於本(五)月二日發表了一個「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對於中共的政治錯誤，現實策略和他與之脫離關係的原因等，有詳細的說明。該文不僅內容具

體，意見正確，而詞句亦甚光明正大，與中共中央及其領袖前後所發表的文件和公開信之造謠，誣蔑和攻擊的態度迥然不同的。

由此可見張先生之「自行脫離（共產）黨」，還是與它有政治主張上之分歧「由於近二十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睹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爲了保持自己獨立的意見，擁護自己認識的真理，不惜犧牲其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而自動脫離其二十年所參加之共產黨的。雖則他對中共政策的錯誤理解較遲，却不失爲一個政治家的態度，自始至終爲其自己理解的政治主張而奮鬥，不容別人束縛其思想之自由，難道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應有的行爲嗎？

同時，中共中央之「開除」他的黨籍，乃是由於他預先已用「書面聲明，自行脫離黨」才決定公佈的。這可說是他不要共產黨，脫離共產黨，而非共產黨不要他，開除他；尤其與過去一般共產黨員被政府逮捕以後，在死的威脅之下宣佈自首脫離共產黨的行爲，有天壤之別。不可同年而語。

不僅如此，張先生是中共的老黨員「獻身革命，垂二十年」，一九二八年做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以後又是共中央政治的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副主席，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直至此次「離陝來漢之前，還是陝北邊區政府的主席」。其資格之老，地位之高，革命之久，實遠超越於米夫提拔出來的新人物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之上，而不下於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毛澤東諸人。因之，他此次「自行脫離（共產）黨」，不獨是該黨內一個重大的事變，也是一件於中國民族大有裨益的事情。因為他是共產黨內很老的領袖，現既「由於近廿年來之經驗和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更不願躬睹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而與之脫離關係，不是共產黨澈底崩潰的證明嗎？共產黨在今天是一羣陰詭計謀者，它之澈底崩潰，使中國歷史除掉一個發展障礙，不是有益於民族的事情嗎？

所以，無如何，張先生之脫離共產黨，是一件有意義，有價值，有人格的行爲，於整個國家民族有極大的貢獻，值得重視。

從他發表的「敬告國人書」中，給我們證明了許多真理。這些真理，是我們所兩在反對共

產黨一貫的認識，嚴格的批評。積極的闡發之所在。於今已由張先生在其用『近二十年之經驗教訓』寫出的「敬告國人書」中給我們鐵一般地證實了。可見在同一歷史階段內，只有一個真理，有見識的人，如能虛心探討，不艱殊途同歸，張先生之於我們的意見，不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嗎？

那末，張先生給我們憑實了一些什麼真理呢？

第一，國民革命的內容。

我們認為，中國過去是一個封建國家，它之走上資本階段，是鴉片戰爭關鍵。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破壞了舊有農村經濟，使封建社會趨於解體，滿清王朝遂不得不屈服於辛亥革命的攻击，宣告終結。但，帝國主義左手雖則搗毀了舊社會，右手却又用不平等條約的鍊子把新社會的經濟束縛起來，不讓其自由發展，致民族的工商業長期陷於幼稚的狀態。其結果，滿清的王朝推翻了，政權却旁落於山封建時代遺落上來的軍閥與官僚之手，陷入割據，分裂，內戰的狀態。各省其自己獨立的政府與軍隊，彼此不相統攝，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以致

國內不能統一，力量不能集中，無法抵抗外敵，求得民族的獨立。一句話：中國不是一個近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

因此，要建設民族國家，就必須繼辛亥命之失敗再來一次新的革命。這個新的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它發動於歐戰期間民族的工商業有相當發展的基礎上，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旗幟。換言之：它的任務，就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要肅清一切殘餘的封建勢力——軍閥割據，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每完全是適合中國歷史需要的進步事業。

自一九二六年由廣東出師北伐起，至前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止，整整十年的韶光，在國民黨及其總裁蔣介石先生領導下，一貫地是進行這個事業。在這中間，由於中共不忠於歷史任務，要把建設近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工作改為建說地方的，割據的工農蘇維埃政權。遂引起國共分裂，造成十年的國共戰爭。其結果，仍是中共失敗，紅色割據消滅，走國民革命的道路。這一歷史過程的內容，完全如蔣先生所言：「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國內的統一；第二期工作：在完成國家的獨立」。

這些意見，中共是不同意的。它們認爲：『自從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起，國民黨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意志，不去把刀鋒向着萬惡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却向着自己的朋友，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叛變了革命』。

然而，今日張先生却給我們證明：『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爲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

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第二，中國革命的動力。

中國當前的革命，既是國民革命，被中共稱之爲：『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其領導的階級，自應以城市的市民——工商業家爲主。別的人民，如工人，農民等都必須參加。一致向封建軍閥及帝國主義進攻，完成其革命的任務，求得三民主義的實現。

在這中間，由於中國處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天，當它還在由封建階段過渡到資本階段時，歐美的先進國家已開始由資本階段走向了社會階段，爲要適應世界潮流，迎頭趕上去與之並駕齊驅，不得不將兩階段的歷史任務一氣完成，即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的任務，發達生產，建設統一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又從事社會主義的工作，平均分配，創造共有的大同世界。照社會科學的道理說來，完成前一任務，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實現後一工作，則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小資產階級隨歷史的進化而依附於兩者之任何一方，故亦獲得適當的利益。所以，國民革命是民族性的革命，代表各階級利益。

因此自始至終，中國內部的人民，既不能有顯明的階級利益的分化和對立，也沒有爆發成功的政治鬭爭之可能。其情形完全如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云：「抗戰以前，中國經濟狀態尙無發生階級鬭爭之可能；抗戰期間，同仇敵愾，階級鬭爭更不容許其發生；抗戰勝利以後，其於民生主義之計劃經濟，已使共有，共治，共享之理想臻於實現，尤無發生階級鬭爭之必要」。故階級利益常是隸屬於民族利益之下，不能獨立。

這一點，中共以前不相信，現在還是不相信，它們過去要號召工農階級起來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現在失敗了，仍說：『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現在，張先生又給我們證明：『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強強調階級鬭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能近成功

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第三，統一運動的作用。

國民革命既以建設民族國家爲目的，便必須爭取國內的統一，由封建階段走向資本階段的歷史特徵，也就是國內的統一。因此，科學的社會學家說：『有產階級將人口，生產機關，財政的渙散狀況漸漸除去，教人口團聚了，生產機關集中了，財政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從此必然生出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他將各個利害，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勉強團結的區域團結起來，合做一個政府，一樣法典，一致利害，一個國境，一樣稅則的國家』所以，統一是一是資本經濟發展的必然，

中國隨着歐戰期間以來，民族工商業之發展，自亦必然走向統一。從一九二六年起至一九三六年止，經過十年的統一戰爭，不僅消滅了一切封建的割據軍閥，也征服了新式的紅色軍閥，建立了強固的中央政權——國民政府，由此將全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逐漸統一起來，

使四萬萬人民團結成一個強大直民族，於是，新的民族國家誕生了。

這樣一來，不僅開拓了中國未來歷史發展的道路，使之脫離封建的領域，走向文明的境界；且在現階段遇着了日本的侵略，也增強了堅決抵抗的力量，「它使努力統一的政府和領袖知道國防，知道把國家近代化，並且大規模地訓練，講究戰術，努力政治教育，灌輸民族思想國家觀念，以提高戰鬥力。……（所以），有統一才能產生近代化的軍隊，能夠作戰，能夠抗日」（引葉青語）。

反之，如果國家不統一，陷於分裂割據的狀態，軍人彼此不相統攝，力量便不能集中，軍隊亦無從改造，而且互相猜忌和鬭爭，更削弱了內部的實力，怎能抗日呢？要抗日就必須統一，消滅內部的割據勢力，而後才能對外，這便是國民政府及蔣先生執行之「安內攘外」政策適當的所在。所以，不僅是建國的前提，也是抗日的關鍵。

但，共黨對此，不以爲然，如友人葉青所說：「他們一點也不理解山封建到資本以統一爲重要關鍵和必經過程，以及中國資本主義之足破壞封建，形成統一等事。因爲他們一貫地

把統一領袖看成割據軍閥，把統一戰爭看成軍閥戰爭，在策略上和行動上，則完全站在割據立場與統一搏戰』這可從他們十來之進行『蘇維埃運動』中，得到證據，其客觀作用，便是替日本盡阻撓中國統一與抵抗敵人的任務。

今天，張先生給我們證明：『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爲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鬭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統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

第四，國民黨及其政府和主義的性質。

近代的社會運動，必須有政黨領導，才能成功。國民革命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沒有強大的政黨來領導，能夠完成嗎？絕不可能。但，誰領導它呢？無疑地是國民黨。它過去現在和將來，在中國歷史上，都要起積極的革命作用，就過去說：它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執了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任務；後來，沒有澈底成功，又繼續進行，領導過討

袁戰爭，護法戰爭，國民革命和統一戰爭；就現在說；它正在進行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開闢中國及世界未來自由發展的道路；到將來它更要依照三民主義的路線去建設新的國家，創大同世界，這不是它偉大的革命作用嗎？這不是它一貫的革命精神嗎？

不僅如此，它自實行國民革以來，便建立了一個強固的中央政權——國民政府，作創造新中國的樞紐。這個政府是近代化的，它完全懂得中國現階段的政治問題，能夠有計劃地去從事新國家的建設，與北洋軍閥時代的北京政府全然不同。它前後所頒佈的政綱，都極合於中國社會的需要，而恰切地把握了中國的政治問題。近幾年來，更積極地從事內政的改造，經濟建設和國防的準備，奠定了此次抗日的基礎，所以，國民政府是近代的，統一的中央政權，爲今天抗日的國防政府。

它之成立，是三民主義出現的結果，而其本身，又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工具。中國近百年來，本有三大問題存在，必須解決，卽民族，民權，民生三者，對此三者發生的由來及其解決的辦法作系統說明的理論，便是三民主義，其能把握中國的問題，卽適應歷史的發展的

證明；能夠適應歷史的發展。也就是具有革命性質的表現。所以，三民主義本質上是革命的政治主義。

因此，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三民主義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不可分離。三民主義是政治的靈魂，國民政府執政的工具，國民黨則是領導的組織，三者之中，無論就理論和事實說來，都不能不說是革命的東西，具有革命的性質，無可否認。

然而，中共却沒有一貫的認識，以前把國民黨看作豪紳，地主，軍閥，資本家的政治集團，把國民政府罵成賣國的政府，把三民主義詆毀爲「胡說狗屁的思想」。因此在其十大政綱中，提出：「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就在長征失敗，投降國民黨以後，仍舊要把國民政府推翻，重新建立國防政府；而且不承認三民主義本質上是革命的政治主義，替它畫蛇添足地加上一個形容詞，叫做「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一切，都是我們曾經批評過的地方，現在張先生給我證明說：「中共……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爲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

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爲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爲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實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優良傳統，牠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尙担负着神聖的抗戰建國的重任，卽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爲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十犧牲者爲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爲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

第五，共產黨參加抗日的原因和目的。

共產黨本來是無產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爲職志。但。因中國是一個經濟後的國家，資本主義尙未充分發達，無產階級的數量非常之少，無覺悟的階級意識，既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也沒有進行社會革命的人的條件。故共產黨缺乏存在的基礎。

可是，由於列甯死後官僚化了之第三國際的盲目領導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相配合，

中國也居然成立了一個共產黨。它本是一些學生，小商人，農民及少數工人等份子所組成，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集團，自始至終冒着無產階級的名分，自稱爲「無產階級的政黨」。事實上，它的政治路線，除仰承第三國際官僚們的指導以外，始終沒有澈底認識過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真相，純憑主觀上的幻想來創造革命的奇蹟。

因此，在政治上時常發生錯誤，今天是盲動主義，明天是立三主義，後天又是國際主義（國際路線）一句話：不是左傾，便是右傾，老是在機會主義壘子裏亂鑽。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表現。其十年來的「蘇維埃運動」不僅沒有絲毫社會主義的氣味，實在是一種反動的農民運動，爲帝國主義侵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它客觀上是一個地方的，割據的勢力，我們稱之爲「紅色割據」，其所盡的作用，不外破壞國內的統一，阻撓民族國家的形成，因而也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障礙。

所以，我們堅決肯定中共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羣小資產階級的陰謀詭計者。他們以前進行的『蘇維埃運動』，是一種軍事陰謀；現在隨着「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失敗而參加抗

日，又是一種政治陰謀。它之自行拉下紅旗，倡言「國共合作」，主要是由於軍事陰謀失敗了，企圖取得合法的領導地位，進行開活動，徐圖發展自己的勢力，準備將來再幹一次軍事陰謀的暴動，奪取政權，並不是出於真誠的愛國，否則，當「紅軍」竄入川西時，「毛澤東（爲什麼還）估計長征是勝利，它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呢？所以，抗日之於共產黨，不是以擁護國家民族利益爲最高目的，而是一個發展派系利益，奪取政黨的手段。

這一點，於今張先生又給我們一個系統的證明說：「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牠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牠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的客觀形勢，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

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中國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為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吾人近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

第六，西安事變與陝北邊區的真相。

中共既是一羣陰謀詭計者，不了解中國歷史的大問題，自不能做正當的推進歷史的革命事業，便不得不如馬克思所言：「他們的事業是在預先拿住革命的發展進程，用矯揉造作的方法使之變成一種危機，沒有革命的條件要於倉卒之間製造一種革命，他們以為革命的唯一

條件就在充分組織他們的陰謀詭計」。

因此，到處策動內亂，企圖達到其趁混水摸魚的目的。前年西安事變，便是他們於窮蹙邊隅之時用以解圍的方法，完全是一種軍事陰謀，發動的人雖是張學良，策動的却共產黨，這是誰也明白的事。後來，因為全國輿論底公憤和一切力量底動員，不得不停止活動，和平解決。但，他們自始至終不僅不承認是自己所幹的陰謀，反要嫁罪於人，說是托洛斯基派進行運動，真是無恥已極。

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於技窮力竭之餘，不得不向國民黨投誠，取消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改為邊區政府，停止土地革命。但，形式上雖已變更，實質上却絲毫未動。在陝北邊區的各縣，至今還有兩個政府，兩個縣長，儼然形成兩重政權對立的怪象。故我們曾經一再指出：這是一種紅色的割據勢力，和軍閥割據一樣地應該消滅。

同時，「紅軍」雖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却和封建的軍閥軍隊一樣，有其獨立編制，私派的人員，特殊的行政，而且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蔑視最高統帥——蔣委員

長的威權，擅由其首領向外通電作種種虛僞宣傳，有所謂「朱，彭通電」的怪事。故我們稱之爲「紅色軍閥」；並指此爲破壞近代國家軍隊一元化的反動行爲。

這一切中共以前都不承認，詆我們爲「托匪漢奸」。於今張先生又給我證明：「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實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統一戰綫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謬誤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因此，他希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

上述六點，都是我們近幾年來對中國歷史及中共一貫的認識和批評的所在。許多青年以

前受中共欺騙宣傳的蒙蔽，不相信它是真理。於今張先生以其「近二十年之經驗教訓，……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者「自行脫離」，與我們的意見趨於一致，不是真理一元性的證明嗎？

不獨此也，我們一向看出：中共自政治主張破產後，政治道德亦隨之破產，成爲一個不明禮義，不知廉恥，不負責任，不守紀律，的陰謀詭計的集團，專以措造謠言，誣蔑人權，混亂是非，破壞抗日爲事業，終日和王婆罵街一樣，詆陳獨秀，葉青，鄭學稼諸人爲「托匪漢奸」，種種卑劣行爲，真是筆難罄述。因此，它對於我們的批評，絲毫不加反省也不作任何理論上的答復，而只暗中烏亂，採取鎖銷路，阻止 刷等手來對付。這是一個領導羣衆的政黨應有的行爲嗎？不！中共的黨員全是一羣陰謀詭計者，絕無絲毫政治家光明正大的態度。

就以張先生而論，如他自己所言：「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中共同人原無所~~其用~~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

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的，陰謀煽惑宣傳，企圖對內抑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一個參加中共「垂二十年」的老黨員兼領袖，一日由於政治意見之不同，「自行脫離黨」，便對他「造作種種謠言」，「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則其罵外人做「托匪漢奸」，又何足希奇？這種行為，除今日的中共及其「祖國」的共產黨以外，其它稍有政治道德的政黨幹得出來嗎？列寧時代的俄國共產黨對普列罕諾夫輩曾經是如此的嗎？所以，今日的中共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共黨而是一羣小資產階級陰謀詭計者的集團了。

青年諸君！這就是中共今日真實的面貌。你們願意忠誠地愛護中華民族嗎？你們願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嗎？你們願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嗎？如果願意，那就必須批判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宣佈共產黨的死刑。因為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國歷史進化主要的障礙物——無目的的騷亂主意者。從來惟恐中國不亂，以便它趁混水摸魚，快其私圖。只有消滅了它，纔能使中國歷史順利地前進，由三民主義的道路走向光明燦爛的大同世界。

最後，我們歡迎張先生到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來，共同擔負抗日建國任務！

抗戰響導八期

編後餘話

張國燾脫黨一案，在共產黨看來，是它本身的一種損失，但站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看來，似乎都是國家之福，民族之幸。我說這話，我是絲毫不含有任何意氣，何況我一向是個中立的人。

不管共產黨如何掙扎，共產黨的理論在中國是失却其存在性的。何以故？試聞其說。

第一、中國的革命，澈底的說，應該是

打倒帝國主義，求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

消滅封建勢力，求民權確立的民權革命；

應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民生革命。

因為中國受列強的侵略，外而未能獨立，故非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求民族之解放，則一切內政設施，民權推進，民生改善，無由進行；內而不消滅封建勢力，則國家永不能統一，永

陷於官僚政治，土劣政治之下，無由作建國的工作。惟這一點達到後，則可進行民生之改善——實行民生主義。

但是共產黨的主張，

鼓動階級鬥爭，來分散民族革命的力量；

實行勞工專政，來延長封建勢力的壽命；

推行赤化暴動，使全國民衆尤其是工農失業破產。

結果使建國的工作，不能順利進行而如期完成，坐令敵人的侵略一天天深入，壓迫一天天加重。何等可惜，何等可惜！往事歷歷，言之不勝感慨萬端。

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生產增加問題，不是分配均勻問題。中國是個貧窮的國家，只感到生產不足，從沒有發生生產過剩，所以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別，沒有極富極貧之分；所以中國現在是不會有階級對立。

問題的中心，是怎樣增加生產，來適應全民生活的需要。共產黨不從改良生產術技着

想，而求增加生產，只專心於土地沒收，結果何如，十年來的教訓，還不夠癩嗎？

全面抗戰之今日，共產黨應澈底覺悟，勿爲民族罪人！到了亡國的時候，既不能有勞工專政之呼號，惟有爲日本臣妾奴婢之被鞭打的飲泣而已，更不會有階級對立之鬥爭，只有主人之怒罵聲與奴婢之強笑聲而已。

思之思之，慎之慎之，張國燾畢竟還不失爲一個有先見的人。他的民族意識，愛國情緒，超過愛黨愛主義之心；他記取中國，沒有一意傾向國際老板。

我希望共黨一九二二一宣言向中國全體同胞完全兌現！

尼司於漢口，二十七年，五卅紀念日。